

营商环境优化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效应

——基于 SDM 模型的实证研究

杨兰品 韩学影¹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我国创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创业企业存活率提升却不明显，这要求对创业行为关注的重心应该由创业数量转变为创业质量。文章以 2010—2018 年我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 SDM 模型分析政务、金融、人才、市场四个维度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同时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影响创业质量权重最大的营商环境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四个维度对创业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人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最大，人才环境每提升 1% 会促进本地和相邻地区创业质量分别提高 0.575% 和 0.349%，金融环境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最小，分别为 0.194% 和 0.119%；东部地区提升市场环境和人才环境带来的边际贡献最大，中部地区创业质量的提升需要建设人才环境，西部地区则受政务环境的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优化政务环境，完善创新创业人才体制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体制创新，发挥各地营商环境协同效应，促进创业质量提升。

【关键词】：营商环境 创业质量 莫兰指数 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21）07-0056-1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长的压力下，发挥创业的先导作用，推进动力机制转换、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是重要的突破口。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及 2017 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 号）提出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创业环境，让创新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根据《中国创业青年发展报告（2020）》的数据，2019 年创业企业新增 700 万家，几乎平均每天都有 1.9 万家创业企业成立，但是根据过往的经验证据，新创企业的成活率却只有 20%^[1]。中国面临创业数量增幅明显，但是整体创业质量水平亟待提高的严峻局面。

创业质量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更需要提升创业质量进而促进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对市场主体的兴衰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提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放管服改革、政商关系重塑等方面不断加大推进力度并取得巨大进展，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跃居第 31，并且连续两年被评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区域创业质量与

¹**作者简介：**杨兰品（1964-），女，河南汝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公共经济；

韩学影（1996-），女，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公共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政商关系的深层逻辑、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研究”（18BJL048）；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应对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经营冲击的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研究”（2020zy219）

营商环境要素水平息息相关，创业质量的提升必然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促进创业、提升创业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就业状况和民众的生活水平，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因此，深入和具体分析营商环境不同维度建设状况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促进程度，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营商环境建设策略，既必要也迫切。

基于此，本研究从营商环境的视角出发，厘清影响创业质量的外在因素，将创业活动嵌入到区域政务、人才、金融、市场的营商环境背景之中，摒弃重数量而忽略质量的误区，通过考察创业存在的空间效应，运用 SDM 模型分析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营商环境的不同维度对于整体和区域创业质量影响的异质性，从更深层次挖掘创业质量的内在规律及其与区域营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构建有利于创业企业成长的营商环境进而使创业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核心力量提供理论基础与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世界银行于 2002 年启动《营商环境报告》研究项目，初步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在经济体内面临的创办和发展环境，而后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做出界定，如从一般到具体将营商环境分为政法、生态等宏观方面以及政企关系、金融服务等微观方面^[2]；从投资角度将营商环境划分为政府服务便利性、市场体系的公平性等要素^[3]；从成本角度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从市场准入到纳税、申请破产等一系列活动所需成本总和^[4]。对于营商环境的衡量，学者们也基于中国整体、区域、各省份、全国城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不同层次构建指标体系，立足营商环境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评价^[5-8]。

创业质量不仅体现在创业活动带来直接的创新驱动增强和资本增加，也体现在间接提高经济产出潜力和就业机会^[9-10]，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创业活动所产生的财富与价值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程度^[11]。目前学界对创业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为两方面。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企业内部，关注创业者的职业观念、在创业前的职业流动、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开发^[12-15]以及创业团队质量、创业平台等^[16-17]微观层面，研究创业企业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创新程度以及提升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掌握。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影响创业质量外部因素。Pyayt 等（2018）立足社会认知理论，搜集 38 个国家的 24457 个数据检验创业教育的作用，结论显示创业教育对创业成功率影响深远^[18]。Jason 等（2019）选取了 29 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利用生态因子和多级建模对创业和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文化氛围确实影响创业活力水平的结论^[19]。董耀武和雷长群等（2018）基于知识溢出理论，通过数量分析论证知识溢出会提高创新型企业占比，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经济增长速度^[20]。

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外部条件，资源的可得性、整合性及机会利用性是提升创业质量的关键^[21]。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出发，认为创业企业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创新将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比如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减缓企业寻租对市场的扭曲作用，减弱关系型借贷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增加企业金融发展带来的创新活动资源投入比重^[22-24]，达到创新优化创业质量的目的。杨继瑞和周莉（2019）从宏观角度出发，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企业的外部市场扩张，尤其是处于资源积累阶段的创业企业，营商环境对其稳定发展、创业质量提升发挥重要作用^[25]。沈荣华（2020）从理论上系统分析我国营商环境改革成效及发展短板，提出营商环境的发展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切实帮助企业走出发展困境^[26]。雷挺和栗继祖（2020）采用非空间 Tobit 模型分析营商环境对企业内在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并得出营商环境优化将同时提高企业绩效和二元创新边际效应^[27]。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对于影响创业质量的因素，大多是从企业内部和社会因素的单方面进行研究，将整个创业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纳入研究范围的不多。营商环境作为揭示区域创业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不同的关键变量，与区域创业数量和质量水平息息相关。为厘清营商环境影响创业质量的多路径，本文基于创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程度。

三、理论分析

创业活动高质量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会受到众多方面影响。营商环境作为构成创业活动的直接外部系统，对区域内的创业活动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外部约束。Audretsch 和 Keilbach(2008)曾指出，企业的区域生存环境差带来的弊端难以弥补，由此可见一个优质的营商环境将促进新企业的出现及发展^[28]。同时区域整体的创业质量不仅建立在微观创业活动数量的基础上，更与区域营商环境水平息息相关，优质营商环境在提升创业质量的同时，形成区域创业环境的改善和区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的正向马太效应^[29]。为了更好地探索营商环境影响创业质量的路径机制，除了分析营商环境影响创业质量的总体效应外，进一步将营商环境归类为政务、人才、金融、市场四个主要因素，剖析不同因素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机制。

（一）营商环境影响创业质量总体效应分析

营商环境决定了创业企业能否获得各类生存要素，是构成商业生态的重要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得更优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更全面的社会支持，从而减弱资本等稀缺资源对新创企业的约束，降低由于缺乏支持从而资源耗竭退出市场的概率^[30]，提升环境可承载的组织数量，促进新企业创建。在好的营商制度环境中，产权保护、司法公正、契约履行、政府守法等方面通常更有效，通过市场创造财富的收益较高，而通过政治影响和司法获得再分配利益的机会并不大，因此资源和要素将更多地被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同时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缩减企业经营管理中繁杂的行政手续，降低企业潜在成本和交易成本，政府应从企业角度出发，全面改善和提高营商环境水平。各级政府在增加财政税收和促进地方经济繁荣的追求下，基于地区发展现状，通过制定完善服务、吸收人才、优化金融规则、规范市场等相关政策法规，调整营商环境水平进而提升创业质量。

（二）营商环境主要维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机理

（1）政务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完善的政务环境能确保创业企业及时获取市场服务、财政税收补贴、融资贷款支持和产业配套支持等多方面保障，给企业提供适合生存的外部环境。其一，政府为新创企业提供市场服务方面。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增加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的便利度，提高政府服务化水平和效率，引导企业合理分配资本、人才等稀缺资源，减少政府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降低制度交易成本^[31]，同时协助创业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提升区域创业意愿。其二，政府帮助新创企业获取贷款支持方面。特别是创业企业处于资源积累阶段，其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其技术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政府通过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建立银行、政府和企业合理分担信贷风险的机制，解决创业初期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创业企业资金不足导致破产的风险。其三，政务服务环境方面。政府通过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从压缩政府寻租空间、加剧市场竞争的角度提升创业质量^[32]。新时期“亲”“清”政商关系的不断推进，政府与企业关系趋于清白，行贿受贿、政府寻租等腐败行为减少，清廉化、规范化的行政建设有利于创业质量提高。其四，公共基础设施优化方面。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决定区域可供生产和生活使用的基本物质要素的状况^[33]。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各种高端要素自由流动，推动高创业质量的企业在公共环境优良的区域集聚分布。

（2）人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人才是企业知识资本的基础，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34]。一个地方的人才环境可以优化城市创业机会分布，增加创业成功率^[3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也关键取决于本区域人才环境，2018年以来全国一、二线城市的“人才抢夺战”是最好的证据。人才环境的优劣通过影响人力资源质量从而直接影响创业质量。人力资源的高敏感性、高警觉性、高风险承担能力有利于提高把握并利用机会的可能性^[36]，防止出现无法识别商机的情况，减少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及经济损失。同时，人才在获取、处理、整合资源方面的能力较强，可利用较小的成本取得更好的资源质量和数量。当企业面临重要的战略决策时，高层管理人才可以快速准确制定战略决策，在保证决策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并实施决策，进而获得时间上的竞争优势^[37]。人才环境的优劣通过影响知识溢出从而间接对创业质量产生影响，优质的人力资源会提高创新创业占比，增加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创业者的知识转移绩效促进创业质量的提高。创业者人力资本会通过直接转移为企业层面的管理决策以及间接转移为企业员工共有的知识两个路径实现知识转移的融合，从而增强创业企业发展的动力^[38]；另一方面，良好的人才环境可以缩小由知识等稀缺资源数量和配置不同产生的差距，对创业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

(3) 金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良好的金融环境可以提升融资可得性, 提高创业成功率达到促进创业质量的目的。初入市场的新创企业缺乏原始积累, 对金融服务、制度等外部环境存在天然依赖性, 迫切需要安全、丰富的外部资源^[39]。一般来说, 创业企业初期资本积累较少, 财务柔性储备不足且不稳定, 由资本积累、个人贷款等所获得的资金不稳定、不持续, 无法从源头满足创业企业的需求, 因此融资是创业企业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通常创业企业选择较发达地区进行创业活动, 主要是由于金融业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发育更完善、金融生态环境更稳定、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水平更好, 提高了创业企业的资金获取便利度^[40], 缓解创业企业融资窘境。发展程度更高的金融环境可以通过融入科技手段减轻金融系统压力, 从而促进创业质量提升。通过将传统的金融行业与现下高速发展的科技结合,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和创业质量^[41-42]。金融科技所提供的服务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等多种技术, 使企业在享受便利金融服务的同时, 可获得更多元的融资方式、更透明流动的信息、更低的金融服务交易成本^[43-44]。

(4) 市场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中国创业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及其不断完善的过程联系密切。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逐步加快, 创业的活跃程度越来越能反映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市场经济活力, 开放的市场环境意味着更完全的市场竞争, 更高质量的交易空间, 更严格的法律保障体系, 有利于减弱对创业活动的制约。一个地区的市场环境越开放、包容, 市场化水平、程度越高, 新创企业获取资本人才等稀缺资源越便利, 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45]。好的市场环境会降低新创企业获取信息的阻碍和成本, 企业通过分析信息有助于新创企业降低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错配的风险, 帮助新创企业根据市场上其他竞争者产品价格走向制定合适高效的策略, 预测进入市场中遇到的可能问题以及评估解决问题最优解的可行性, 提高新创企业的创业质量。市场环境会影响新创企业的生存, 公平的市场环境通过消除市场歧视, 为每一位创业者提供公平的市场机会, 降低了创业门槛, 有利于形成“大众创业”的环境^[46], 减少企业家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机会, 带动创业氛围, 促进企业创业质量提升^[47]。

综上所述表明, 政务环境通过优质的行政服务、宽松的信贷政策支持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等方面为创业质量的提高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人才环境通过集聚创新创业人才和提高知识溢出程度等方面为创业质量的提高提供智力支持; 金融环境通过提供低廉的融资成本、完善的金融制度以及优质金融产品服务等方面为创业质量的提高提供资本支持; 市场环境通过提供高效快捷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公平的市场机会等方面为创业质量的提高提供有效市场支持。总之, 营商环境的政务环境、人才环境等四个维度都对创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并且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能更好地改善区域创业质量。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本部分旨在探究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多维度的影响效应, 深入挖掘和系统剖析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同时考虑创业存在的空间效应, 采取空间计量模型精准分析营商环境各指标对不同地区创业质量的影响程度。观测营商环境主要因素对创业质量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同时在地理上划分东中西部进一步识别影响不同区域创业质量的主要因素, 为创业质量提升及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参考意见。

(一)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创业质量 (equality)。现有文献中对创业质量进行衡量的指标常用的有: CEPA 指数、新建企业率、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市场参与创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比重等, 大多数文献采用单一变量对创业质量进行刻画, 从理论上很难科学地衡量创业质量。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等外部因素, 对创业质量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 用 R&D 投入占 GDP 比重、高科技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来衡量创业质量, 并用熵权法进行赋权, 最后得出创业质量指标的最终数据。

核心解释变量: 营商环境。本文综合其他学者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本文研究分析, 将营商环境分为政务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公共环境。政务环境 (gov) 借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的部分指标, 凸显政府的政务服务、公共基础建设,

用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衡量；人才环境（tal）衡量地区人力资源水平、吸引人才能力，用高校在校专科和本科生人数、城镇就业平均工资水平、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衡量；金融环境（fin）的衡量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银行等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业从业人员；市场环境（mar）借鉴彭迪云等区域营商环境的指标，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私营企业利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重、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比、国有及国有资产控股产品收入占比、进出口额占 GDP 比重衡量。

控制变量。企业家精神（es）用各省份人均中华老字号数量衡量^[48]；区域产业结构（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49]。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实证模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与传统的计量模型相比，空间计量模型考虑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创业观测值不仅受到本地营商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邻近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因而估计结果更具准确性。并且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是由地区之间的绝对和相对位置决定。空间计量模型由 SAR、SEM 和 SDM 三类模型构成，不同模型所假定的空间传导机制并不相同，其内在经济意义也有所区别。SAR 认为因变量会通过地区之间在空间上相互作用影响其他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其空间依赖性主要由单一参数刻画；SEM 认为随机冲击导致空间性的产生；SDM 模型则同时考虑了上述两类空间传导机制和空间交互作用，即本区域的因变量也依赖于临近区域的解释变量。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公式为：

$$\begin{aligned} y_{it} &= \rho \sum_{j=1}^N W_{ij} y_{jt} + \beta x_{it} + \phi \sum_{j=1}^N W_{ij} x_{jt} + u_{it} \\ u_{it} &= \lambda W u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y_{it} 为本地被解释变量； w_{ij} 为本地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权重矩阵； x_{it} 为解释变量； w_{jt}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权重矩阵； u_{it} 为误差项； w 为误差项的权重矩阵； ε_{it} 为 u 的误差项； i 、 t 为个体和时间。当 $\beta = \phi = 0$ 时，模型为 SAR；当 $\rho = \phi = 0$ 时，模型为 SEM；当 $\lambda = 0$ 时，模型为 SDM。由于考虑邻区解释变量会对本区因变量产生空间效应，所以选取 SDM 进行实证分析：

$$\begin{aligned} \text{equality} &= \beta_0 + \rho \sum W \text{equality} + \beta_1 W \text{gov} + \beta_2 W \text{tal} + \\ &\quad \beta_3 W \text{fin} + \beta_4 W \text{mar} + \alpha_1 \text{es} + \alpha_2 \text{is}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equality 为创业质量； W 为空间权重矩阵；gov、tal、fin、mar 分别代表政务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市场环境；es、is 分别代表企业家精神、区域产业结构； β_1 、 β_2 、 β_3 、 β_4 分别为政务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市场环境的系数； α_1 、 α_2 分别表示企业家精神、区域产业结构的系数； ρ 指本地创业质量受临近地区创业质量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ε 为随机误差项。

空间权重矩阵刻画出各变量在空间上相关性的程度，并且空间距离远近会对变量依赖程度产生影响。式（3）的空间权重矩阵 W 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 30×30 的（0-1）地理邻接矩阵，即两省份在地理上存在接壤则为 1，反之为 0。其矩阵元素如下：

$$W_{ab} = \begin{cases} 1, & \text{区域} a \text{ 和 } b \text{ 相邻;}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quad (3)$$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 2010—2018 年我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存在的空间效应。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中国区域经济运行报告》等。对于部分省份某些年份数据未统计或不可获得，则通过对数据进行预测填补。文中对除控制变量外的其他指标数据做归一化处理去掉量纲，确保各省域之间的数据彼此之间具有可比性，消除原始数据数量级的影响；再通过熵权法客观赋权，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保证数据更准确有效。

五、实证分析

（一）空间性检验

为了使用空间计量模型，首先进行空间性检验，用 STATA 软件对 30 个省级行政区做全局莫兰指数 I 和吉尔里指数 C 的测算，在 0-1 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全局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的双边概率测算值，Moran. I 和 Geary. C 在所有年份都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创业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为此，应选用空间计量模型来避免一般模型研究的局限性，提高结果准确性。

由于全局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只能得出存在空间性的结论，无法识别空间的“热点”和“冷点”，因此在全局莫兰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局部莫兰测算对创业质量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在此只选取 2010 年和 2018 年的局部莫兰指数，并得出局部莫兰散点图，如图 2、图 3 所示。2010 年和 2018 年创业质量的局部莫兰指数总体呈现集聚的趋势，表现为“高一高”和“低—低”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创业质量的空间集聚性有所提升，以及创业质量高的省份其相邻省份创业质量也高，创业质量低的省份其相邻省份创业质量也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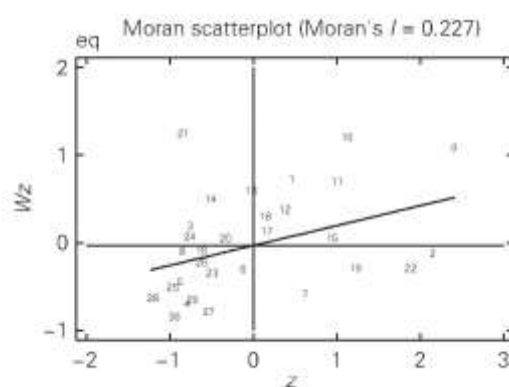


图 2 2010 局部莫兰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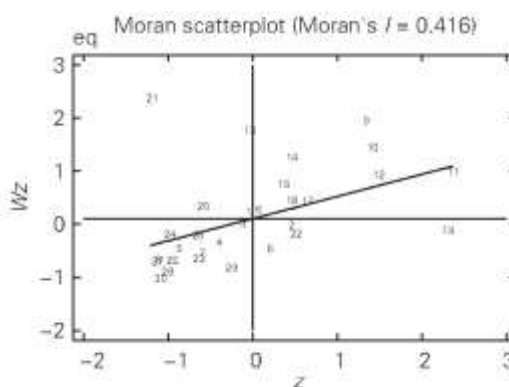


图 3 2018 局部莫兰散点图

（二）空间计量分析

1. 基准检验与模型确定

为了探究营商环境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大致关系，使用 OLS 方法做基准回归。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 VIF 最大值为 4.28，远小于经验值 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可以看出，营商环境的大部分指标对于创业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各维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市场环境和人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程度较大，但是由于政务、人才、金融、公共四个维度存在自相关性，因此 OLS 估计结果可能不足以精确反映客观事实。为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考虑空间效应的 SAR、SEM、SDM 模型对各省份 2010—2018 年面板数据做计量分析。

SAR、SEM、SDM 模型回归估计结果，其中（1）（3）（5）是固定省份的实证结果，（2）（4）（6）是固定年份的实证结果。三类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基本都是显著的，证实本地创业质量受本地营商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相邻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其中固定省份 SDM 模型的实证结果最优，政务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市场环境分别在 5%、1%、10%、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然后分别进行 Wald 检验、LR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得出准确的具体模型。对于 SDM 是否会退化成 SAR，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回归结果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 SDM 会退化的原假设，因此选择 SDM 模型；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 SDM 会退化的原假设，则 SEM 模型不会退化成 SDM 模型。Hausman 检验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显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应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由此确定本文应选取固定效应的 SDM 模型进行分析。由于 SDM 模型同时包含因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因此估计系数只能证明因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存在影响，无法准确衡量因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必须分析空间效应的大小和方向。

2. 空间效应分析

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的空间效应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直接效应是本地营商环境水平对本地创业质量的影响，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表示本省营商环境水平对相邻省份创业质量的影响。各维度对创业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大部分显著为正，并且各维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其中人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都是最大的。同时，市场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也较大，金融环境和政务环境的影响较小。

政务环境的直接效应系数为 0.117 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务环境每提升 1%，本地区创业质量将会提升 0.117%，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本地区政务环境水平提高而导致相邻地区政务环境下降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各地政府间会通过协同及竞争关系不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达到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政务环境的共同目标；人才环境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0.575 和 0.349，都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人才环境每提升 1%，本地区创业质量提升高达 0.575%，相邻地区提升 0.349%；金融环境每提升 1%使本地区创业质量提升 0.194%，相邻地区创业质量提升 0.119%；市场环境对本地的创业质量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本地市场环境每提升 1%，本地创业质量提升 0.528%，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是 0.323%。

之所以本地营商环境会对临近地区创业质量产生影响，基于各维度的具体实证结果分析如下：一是各地政府存在竞争，优质的政务环境会对周边地区存在示范引领作用，周边地区通过模仿好的政策、措施提升自身政务环境水平，进而提高创业质量；二是好的人才环境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人力资源水平质量越高，对创业机会的把控和创业质量的提升越有利，同时由此带来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对周边区域人才环境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整体上容易形成高创业质量的“热点”；三是金融环境会

为本地创业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借贷条件，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形成由金融环境引起的企业集聚，对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存在积极作用；四是市场环境是吸引创业和提高创业氛围的重要条件，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提高信息的流通性和获得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更强硬的行政、法律支撑，会对整体区域的创业质量产生正面影响。

关于各个维度对创业质量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创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政府只需要简政放权并且遵循经济规律进行必要的调节，让市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市场环境对于创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同时根据 GEM 项目对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的区分，一般来说机会型创业的创业质量要高于生存型创业，高质量人才可提高具有创新性和增长导向的机会性创业占比，对经济和创业质量提升作用显著。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金融环境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环境滞后一期结果显著，且扰动项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所以采取系统 GMM 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 Hansen 的统计量为 22.59，结果显著，所以上述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4. 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我国营商环境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方面是各区域营商环境水平不平衡，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将 30 个省份按照现有划分标准分为包含 11 个、8 个、12 个省级行政区的东中西三部分，分区域探讨营商环境维度对创业质量的效应。考虑由于每个地区样本数量不一样，得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无法横向比较，但是通过对每个区域的结果单独分析，可以针对每个区域出现的不同问题提出对应解决策略。

分析可知，营商环境不同维度对各区域创业质量的影响是存在空间差异的。对东部地区来说，营商环境维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是积极和显著的，这与东部经济水平高、发展速度快、市场开放度高、信息流通透明度好的现状相符，其中市场环境对创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究其内在原因是因为优质的环境会吸引大量有创业意愿和潜在创业意愿的人才去创业，且只有在市场环境优越的情况下，人才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创业质量和经济效益，因此东部市场环境在创业质量提升中最为重要。反观中部，人才环境对中部创业质量的影响在 1% 的条件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中部地区创业质量受人才的影响较大，而市场环境会对创业质量产生消极的影响，中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没有沿海东部地区发达，市场运作很大程度上靠政府维持，这就导致在资源分配、结构调整等环节可能不够高效，对创业企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人才环境对中部地区的创业质量影响最深，这就要求中部地区要重视人才建设，近几年，山东、河南等地区的“人才抢夺大战”也论证了人才对于中部地区的重要性。西部地区只有政务环境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创业活动对政务环境存在路径依赖，政商关系长久以来存在固定的联系，并且由于政商关系的黏性，这使得虽然政务环境变好，但是切断了原有的政商联系方式，从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创业质量的提高。总体回归中良好的政务环境对创业质量的提升是有正向影响的，因此由于西部目前自身发展状况导致的现阶段政务环境对创业质量的抑制作用不会一直存在。可以推测出西部创业质量受政务环境的影响曲线应该大致是正“U”型，当政务环境逐渐改善，会对创业质量有抑制作用，随着改善程度的增加，抑制作用会增大，并在临界值对创业质量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创业质量跌到谷底；当政务环境继续优化超过临界值，政务环境开始对创业质量带来正向促进作用。所以西部对政务环境的改善要循序渐进，重点加强人才、金融等环境的优化，减轻初期提升政务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0—2018 年中国省级数据，将营商环境划分为政务、人才、金融、市场四个维度，从总—分两个层次分析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同时通过测算创业质量的全局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证实创业质量存在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营商环境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通过分解空间效应进而剖析四个维度对创业质量影响的差异性及存在差异

的深层原因，最后探究中东西不同区域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及内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创业质量不仅受本地营商环境影响，还受相邻地区营商环境影响，优质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维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程度不同。

（2）营商环境对创业质量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性。人才环境和市场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较大，同时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务环境对本地创业质量有积极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且不显著，因此本地区政务环境提升不会导致相邻地区政务环境下降；金融环境会促进本地创业质量提升，同时存在较弱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3）营商环境不同维度对不同区域创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的市场环境和人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最大且显著为正，说明在东部总体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提升市场环境和人才环境带来的边际贡献最大；中部地区创业质量受市场环境的制约；西部地区受政务环境的制约。

针对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主要建议如下：

（1）创业质量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各地营商环境协同优化是提升区域创业质量的重要途径。其中加强对创业质量影响较大的市场环境和人才环境建设，减弱对市场的干预，构建开放、客观、关联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出台更多人才引进政策，提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

（2）根据不同地区创业质量情况制定营商环境优化重心。市场环境对东部地区创业质量影响较大，因此东部地区更要注重市场环境提升，完善市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机制，依法管理市场经济活动，减少资源在市场流动的阻碍；中部地区要在提升市场活力的同时，减少政府对资源分配的干预，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西部地区应注重改变政府与创业企业的关系，政府在提供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和稳定的融资桥梁的同时，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进而减轻企业对政府的依赖。

（3）引导创业企业进行创新发展，鼓励人才进行机会型创业，合理提升创业者和创业企业获取资源的便利度，减弱创业企业初期在管理、规模、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弱势地位，逐步形成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营商环境新体系，逐步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创业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1]SHOOK C L, PRIEM R L, MCGEE J E. Venture Creation and the Enterprising Individual: A Review and Synthe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3): 379-399.

[2]宋林霖, 何成祥. 从招商引资至优化营商环境: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履行方式的重大转向[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9, 20(6): 100-109.

[3]张威. 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建议[J]. 理论学刊, 2017, 37(5): 60-72.

[4]王庆德. 北部湾经济区营商环境优化策略研究[J]. 中国经贸导刊(中), 2019, 37(3): 55-58.

[5]张大海, 祝志川. 因子分析和熵值法下我国营商环境评价[J]. 财会月刊, 2019, 41(18): 124-130.

[6]彭迪云, 陈波, 刘志佳. 区域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 金融与经济, 2019, 41(5): 49-55.

-
- [7]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2013 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22(4):24-34.
- [8]任颀.中国城市企业经营环境评估报告:方法与数据[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55-57.
- [9]MA J,TODOROVIC Z W.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2012,16(3):299-313.
- [10]SCHNEIDER F,BUEHN A,MONTENEGRO C E.New Estimates for the Shadow Economies all over the World[J].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2010,24(4):443-461.
- [11]齐玮娜.创业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区域经济的视角[D].广州:暨南大学,2015.
- [12]芦炜.科技创业者创业动机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40(10):35-41.
- [13]古家军,沈晓斌.创业者职业价值观、资源拼凑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9,40(11):206-215.
- [14]王小伟,牛志勇,周晓艳,等.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9,41(9):125-140.
- [15]王兆群,胡海青,张琅.创业拼凑、机会开发与新创企业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4):1-7.
- [16]葛宝山,王照锐.创业团队行为整合、关系学习与创业绩效——创业团队行为复杂性的调节效应[J].南方经济,2019(10):34-46.
- [17]周文辉,李兵,周依芳,等.创业平台赋能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海尔+雷神”的案例研究[J].管理评论,2018,30(12):276-284.
- [18]PYAYT P,ARVIN S,SAKDIPON J,SANG-YOUN L.The Interplay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s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2018,16(3):398-420.
- [19]JASON L,TAIS B,KEVIN C.The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Long-term Orient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2019,25(6):1235-1258.
- [20]董耀武,雷长群.创业活动异质性及其经济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37(1):171-174.
- [21]WERNERFELT B.Stagflation,New Products, and Speculation[J].Elsevier Journal,1984,6(3):295-309.
- [22]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66(4):84-98.
- [23]张美莎,徐浩,冯涛.营商环境、关系型借贷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2):35-49.

-
- [24]冯涛,张美莎.营商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6):147-153.
- [25]杨继瑞,周莉.优化营商环境: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路径抉择[J].新视野,2019,37(1):40-47.
- [26]沈荣华.优化营商环境的内涵、现状与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20,12(10):24-31.
- [27]雷挺,栗继祖.营商环境优化如何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内在机制及创新边际[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42(12):30-39.
- [28]AUDEETSCH D B, KEILBACH M C. Resolving the Knowledge Paradox: Knowledge-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10):1697-1705.
- [29]齐玮娜,张耀辉.区域环境差异与创业质量的“马太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 SYS-GMM 检验[J].经济管理,2015,37(7):35-44.
- [30]BRADLEY S M, SHEPHERD D A, WIKLUND J. The Importance of Slack for New Organizations Facing “Tough” Environmen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6):1071-1097.
- [31]李志军,张世国,李逸飞,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及有关建议[J].江苏社会科学,2019,40(2):30-42,257.
- [32]梁翠,王智新.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律政策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9,40(2):12-15.
- [33]刘小元,林嵩.地方政府行为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与创新产出的双重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32(5):12-25.
- [34]潘霞,鞠晓峰.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37(14):121-126.
- [35]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J].经济研究,2018,53(6):157-170.
- [36]窦红宾,王超,李海绒.知识资本、资源获取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J].企业经济,2013,41(1):47-50.
- [37]王曦,雷星晖,苏涛永,等.谦卑型领导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战略决策的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8):29-35.
- [38]郑馨,周先波,陈宏辉,等.东山再起:怎样的国家制度设计能够促进失败再创业?——基于 56 个国家 7 年混合数据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7):136-151,181.
- [39]李雪灵,白晓晓.知识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实现的关键作用路径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0,65(18):51-55.
- [40]倪嘉成,李华晶,林汉川.人力资本、知识转移绩效与创业企业成长——基于互联网情境的跨案例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2(1):47-59.
- [41]梁青青.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26(2): 17-30.

[42] 王小燕, 张俊英, 王醒男. 金融科技、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异质性特征、机制检验与政府监管绩效评估[J]. 金融经济研究, 2019, 35(5): 93-108.

[43] 李杨, 程斌琪. 金融科技发展驱动中国经济增长: 度量与作用机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8, 33(3): 44-52.

[44] 杨松, 张永亮. 金融科技监管的路径转换与中国选择[J]. 社会科学文摘, 2017, 18(11): 77-79.

[45] 栗勤, 魏星. 金融包容视角下中小银行的作用与银行业市场结构研究评述[J]. 西南金融, 2017, 41(11): 65-70.

[46] 高同彪. 基于市场化程度视角的中国民营企业创业的区域性差异研究[J]. 科学社会战线, 2014, 43(4): 246-248.

[47] 倪鹏途, 陆铭. 市场准入与“大众创业”: 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6, 80(4): 3-21.

[48] 马忠新, 陶一桃.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学动态, 2019, 60(8): 86-98.

[49] 沈坤荣, 耿强.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22(5): 82-93, 206.